宏观观察

重新建构国际经济规则

□杨正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呼唤着新的国际经济治理，IMF、世行、WTO“三大支柱”纷纷改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陆续进行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但至今没有实质性建树。多哈谈判进展缓慢，2013年底在巴厘岛取得了“早期收获”一揽子协议，能否重拾人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人们仍在观望与期待。

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特点与缺陷

总的来看，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基本特点：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体制、社会市场体制和转轨市场体制汇流，共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二是倡导经济自由化。GATT/WTO的多回合谈判，IMF、WBG的政策及“华盛顿共识”等，都体现了让贸易投资金融更加自由的主张。三是保护产权和鼓励创新。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都很注重创新能力的培育，产权保护严格，并希望推向世界，成为国际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带落后”的大趋势。四是总体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在金融等领域占据绝对话语权，新兴大国的话语权也在增加。五是维护自身优势和利益。各国都希望自身优势产业有更大的自由，劣势产业有更多的保护，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扩张优势产业、维护劣势产业的能力较强，自身利益更能得到保护。六是通过协商妥协来争取共赢。WTO等各类组织总体上是开放的，允许大家提问、争吵、谈判、让步、妥协，基本上是正和博弈而非你死我活，比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倾斜不断增多，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发展中国家任国际组织的高管增多，话语权被迫从G8转到G20，都说明现行规则是可以不断修正完善的，而不必推翻、抛弃或从头再来。当然这些改进也不是坐等来的，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争取的结果，可谓来之不易。

当然，国际规则并非各国好处均沾、自动“兼济天下”的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发展促进功能不足，世界南北差距还在拉大，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实现；技术扩散不足，IPR的过度保护反映了“地球人”宽广胸怀的缺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劳动力流动不足，要素价格均等化只存在于理论上，劳动工资的国际差别惊人；金融和资本监管不足，过快的资本流动、金融衍生产品的膨胀、跨国公司难以监督、美国不承担国际储备货币义务等，都显示出这一领域的规制过少过松，这也是此轮危机的直接原因；规则公平性不足，同样的国际竞争只体现了程序公平而严重忽略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就好比国际拳坛上，不分重量级、不分年龄段的选手在同一舞台比赛，倒更像是中国的打擂台；国情差别考虑不足，比如金融自由化后世界金融危机加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此起彼伏，无不与IMF开错药方、药量过猛有关，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实情。这些方面常为人诟病，如何弥补和修正这些不足，建立更优的、更能广泛认同的规则，需要更高的、适应全球化需要的智慧。

21世纪新议题

危机后，G20、货币联盟、区域合作走上前台。宏观政策协调方面，G20的地位在危机中迅速上升，但随着危机深化和宏观政策取向各异，成员间的合作减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开始遭受质疑。虚拟经济治理方面，去年美欧等六大主要发达经济体达成一项长期性、无限额度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形成了超级货币联盟。

实体经济治理方面，危机以来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美国牵头的TPP和TTIP“两洋战略”更是成为新规则的试验田，很可能对未来国际规则起到“标杆”的作用。两洋战略实质是绕开多边谈判对手，集结部分贸易伙伴，先行达成一致，待规则成熟后再推向多边，形成倒逼机制。中国2002年开始对外商谈自贸协定，目前已签署并实施了12个，涉及20个经济体，中国还将按照“全面参与、重点突破”的原则，推进中韩、中澳、中日韩、中国—海合会、RCEP等自贸谈判。

早期的国际经贸规则大多关注货物贸易的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等议题。1986年乌拉圭回合启动后，金融、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越来越多议题被纳入谈判中。近年，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电子商务、环境保护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备受关注。

国际金融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诞生到现在，最核心体现了美元霸权、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过程。金融上的霸权和不平等，从一定角度来说是最不合理的，比商品与贸易上的不平等意义更大。如基辛格所言，“你如果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如果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你如果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真实反映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当前，国际社会正在从国际货币体系、资本流动监管、汇率制度、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增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等方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服务贸易规则。2013年，美欧联合包括中国台澎金马、香港独立关税区在内的经济体组成的“服贸挚友”，启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致力于制定混合式清单、技术中立、服务模式中立、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等新规则。未来，作为“旧规则”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作为“新规则”的TISA可能最终融合，形成服务贸易规则的新框架。2013年9月，中国宣布参加TISA谈判。

投资规则。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积极展开投资规则谈判，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投资者可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争端仲裁、资金自由汇兑等新规则被广泛接受，投资自由化倾向十分明显。中国政府在2013年7月正式提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与美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结束全球投资规则碎片化的一个契机。

知识产权规则。WTO框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石，但美欧日认为TRIPS范围窄、标准低，于是另起炉灶，联合近40个国家达成诸边《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其目的是扩大保护范围，提升执法标准。尽管ACTA由于标准过高，难以被各国批准，美在TPP相关内容中仍沿用ACTA的一些表述。新的更高的保护知识产权规则对于中国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升全球竞争力有着借鉴意义。

政府采购规则。《政府采购协定》（GPA）几经修改，形成了2012版本。GPA强调非歧视性和公开性原则，促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2012版本目标更多，首次纳入反腐败目标；范围更广，新增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采购实体近500个。2007年底，中国申请加入GPA，但终因与各成员方要价相距甚远而至今仍在门外。

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纪律。危机后，“竞争中立”成为国际经贸谈判无法回避的议题。这一概念并不判断国家所有制的优劣，也不要求国企私有化，而是要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对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财政性补贴有明确的规范和透明度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也为主动参与竞争中立等相关规则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对国际经济规则未来的总体设想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等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大势。尽管新自由主义饱受诟病，但其包含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趋势很难改变，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是方向，也与我国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举措有很大的“公约数”。

为让国际经济规则更加完善、皆大欢喜，国内外学者都做了探索，结合工作实践中的体会，我认为今后国际规则应更加注重“包容、公正、均衡、普惠、中道”五个原则。

“包容”就是让规则更能容忍不同文化背景、制度环境、发展阶段的差异，充分反映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促进包容性增长；“公正”就是更加注重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规则修订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更多体现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均衡”就是让规则更能促进货物贸易内部的均衡、各种要素流动的均衡、货物与服务的均衡、双向投资的均衡、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均衡等等；“普惠”就是要让规则增强发展促进功能，更能推动世界缩小发展差距，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中道”就是让规则更能体现合适的“度”，更有弹性和灵活性，渐进、可控、有效地改善，既要有反映世界大势的方向和目标，也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与路径，使目标正确、方法正确、实施正确三方面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操作中要适合各国具体国情，既不过左也不过右，至道中庸，充分运用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智慧。这五个方面最终致力于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

农村土地公有制三权分离

□郑新立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工业化需要从农村不断输送出高素质的劳动力，在由农民向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身份转换中，他们的承包地如何处理？农业现代化需要发展社会化大农业，如何把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转变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允许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流转。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提高农业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开土地的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大部分依靠农忙季节回乡耕种或交给亲友代耕。这种状况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粗放型耕作降低了土地产出率，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二是在城市工作不稳定难以形成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制约着工业升级的进程。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鼓励外出农民工将自己的承包地转让出去，使土地向规模化经营主体集中。这件事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经在做，只是在国家政策上尚未得到足够支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农村实际出发做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按照《决定》精神，农村土地公有制将实行三权分离：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要稳定所有权，落实承包权，搞活经营权。所有权归村集体，不准自由买卖，就能避免土地的兼并。农户将承包权抵押后，如果失去了抵押物，债权方拿到的仍仅仅是土地的用益物权。承包权归农户，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拥有法人财产权或用益物权，就可获得土地转包收入即财产性收入。承包权有了交换价值，进城农民转让承包权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放开经营权，鼓励种粮大户、农业公司、合作社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有重要作用。

经验证明，有的农民把土地转让出去，获取的转包费甚至超过自己耕种的纯收入。有些地方将每亩地年转让费定为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投资农业搞集约化经营，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积5%，统一良种、深耕、灌溉、施肥、灭虫，单产提高，回报率可达30%以上。要抓紧搞好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为土地承包权流转创造条件。

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当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二是大量社会资金急于寻找投资途径；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四是农用工业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对技术装备的需求。这四个条件同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土地承包权流转，使农民从提高效率中增加收入。按照目前每亩转包费700元计算，一户10亩地每年可收入7000元。两口子出去打工，年收入6万元左右，加上土地转包费收入，家庭年收入即可进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种地的农民由于扩大了经营规模，收入也可以大幅度增加。根据实际经验，在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民种100~120亩地，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农民种50~60亩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第二、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体面的职业。而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在平原、浅丘岭地区，一个劳动力能种几千亩旱地。在南方水稻产区，一个农民能种几百亩水田。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收入将超过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助于形成稳定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力地推动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将会由一个弱质产业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与市场经济有效融合

三权分离，将使土地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效融合。过去，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曾成功地通过两权分离，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指出，国有企业对所占有的国有资产，拥有法人财产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受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现在是把这一成功经验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加以复制，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不应该存在障碍。其中略有区别的是，农村土地有一个用途管制问题。即耕地的流转必须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进行。如果需要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建设规划，并依法办理征地手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明确，土地的占补平衡可以在省域范围内进行。这就可以把农村零星、分散的建设用地资源加以复垦，通过土地市场交易和规划部门统一调剂，满足投资者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重庆市通过地票市场，挖掘农村分散的建设用地资源，既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需求，又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农民收入，起到了一箭三雕之功效。

经济学家

经济时评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

□郭 威

随着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加剧，互联网金融迅速改变着传统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对消费者的习惯与支付方式等产生影响，商业银行面临着创新转型的挑战。为了积极应对互联网经济发展趋势，各商业银行掀起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浪潮。如：加快传统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的升级，抢占更多市场资源；积极探索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创新，基于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在线支付和融资产品体系；利用已有大数据基础将客户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整合，创造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等。创新是传统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创新产生的新问题也带来挑战。

商业银行创新面临的挑战

对传统银行经营模式造成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未来十年，互联网金融将会颠覆银行业的经营模式，银行未来经营模式将打破以网点为主的格局，转向通过网络提供服务。果真如此，当前的网点、网点便利店等实体经营将面临人力成本的内耗和空心化。根据营销的“二八理论”，互联网金融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但也可能会造成创造80%利润的高端核心客户流失，这也给传统的直面式营销带来挑战。

信用违约风险。互联网金融打通了线上线下消费融资的渠道，但对于线上授信审批、个人小额贷款等，缺乏对借款主体的信息对称性，借款主体的身份如何验证存在走着盲点，易造成信用违约风险。比如，目前各商业银行创新推出的线上融资产品，由于线上融资审核客户资质属于非接触性的，小额消费信贷产品无抵押、无面签环节的贷款存在着一定风险，易出现“非法融资”，骗取贷款挪做他用的情况。另外，由于对目标客户个人征信情况信息不对称，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未还问题，贷款催收的难度和成本也将增加。

利率市场化交叉风险。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金融给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带来双线挤压，存款竞争是成本的竞争，而目前一些电商推出的存款理财产品在未来可能突破低风险收益的基金，转向高风险的证券化投资，那么在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加剧，商业银行将提高负债成本，为了保持盈利，需要找利率更高的贷款客户，这无形中加剧了信贷风险，同时，利润当期性与风险滞后性的错配，会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风险隐患。

账户信息安全仍面临技术难题。目前，客户资金损失多是因为密码被窃、不法分子获取个人合法身份而进入银行系统的，目前，一些商业银行推出了软键盘密码输入、手机短信通知、数字证书、第三方认证等账户信息验证与保护方法，但不能彻底防范客户信息窃取，要突破网银信息安全，就需要生物工程相关领域的突破，比如扫描技术和指纹识别技术。

未来发展策略

转变经营方式，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线上银行是降低运营成本，网罗互联网客户群的一种全新方式。近日民生银行联手阿里巴巴即将推出了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指没有物理网点，不发行实体银行卡，所有业务和资金操作都通过网上直销银行来办理的银行，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培养互联网上的客户。商业银行可利用网络平台的便捷支付和信息查阅，以及网络客户资源来进行业务开发和产品销售，实现渠道和客户的直连。线下社区银行是立足社区，结合当地金融服务需求而开设的集业务办理和咨询服务于一身的微型银行。实体网点安全性和对大额交易的操作经验以及面对面营销、高端客户维护是互联网金融暂时完成不了的，现在国内的几大股份制银行，如民生、兴业、中信、平安、广发等都在推行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就是传统银行后台的触角延伸，主要定位就是便捷、高效、安全的社区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应利用物理银行与互联网银行双重优势，实现创造利润发展方式的转变。

建立智能支持系统，实现服务系统的再造和升级。一是商业银行要坚持数据大集中发展方向，在各一级分行数据集中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规范，进一步改造、整合、挖掘现有的核心业务系统；二是商业银行要建立一个全面基于互联网、具有决策支持功能智能型系统，以支持银行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数据挖掘、行为分析、精准营销、后续服务为一体的“闭环管理”智能系统；三是应看到商业银行应与互联网金融的共生关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嵌入，联合咨询、电商、券商等多方资源，打造一揽子金融服务平台，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使二者实现互惠的共生关系。另外，随着“微信”等第三方平台的兴起，银行业在与其加强合作建设服务新渠道的同时，应该着力设计面向互联网应用的开放平台，实现与互联网应用快速有效对接，以快制胜。

打造特色网络融资与理财平台。以供应链融资、贸易融资、消费贷款、质押贷款等适合线上运作的信贷产品为重点，积极推动融资产品、流程、机制创新，面向中小企业、小微网商和个人客户推出在线、自助式的融资服务。尤其针对目前融资难的中小企业，要大力开发线上供应链金融，共享1+N供应链实时交易信息，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在线整合，即将过去的核心企业、经销商、供应商、物流公司和银行搬到线上，一方面有利于商业银行实现全流程的审查，了解真实交易背景，另一方面，有效解决中小企业供应链条中各个商家的资金短缺，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要扩展多元化的网络理财渠道，整合基金、债券、保险和互联网的渠道来增加客户来源，吸收存款，从而把控整个商业模式和金融运作产业链。同时，加强与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的合作，在电子渠道开发理财、外汇、基金、保险、贵金属和私人银行等产品线，打造线上综合财富管理平台，并不断完善产品信息检索、理财规划咨询、理财方案定制、产品售后转让等在线增值服务。

完善内部信用体系，加强信息安全与客户端安全管理。为解决线上融资过程中，因空间限制对借贷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应加大内部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征信系统的收集与补录工作，利用内部渠道实现在线信用评级和风险控制，并且授信依据信用状况和资质情况实时更新；同时，要加大账户安全管理的科技含量，开发客户信息认证的扫描技术和指纹识别技术，切实避免网络安全漏洞发生，确保网络客户的资金安全。

总之，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正在以一种开放、共享、合作的特质逐步与传统商业银行相互交融，也将唤来一场金融行业的变革。商业银行要在金融改革浪潮中逐鹿，必须改变传统的战略理念和经营方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利用自身已有的大数据体系将客户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整合，创造一个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同时，依托线上银行和社区银行等线上线下经营模式，抓住实体店客户和线上客户，创造1+1>2的效益，要做好科技与产品线的升级，在创新经营的同时，把控好风险底线。